

歐洲內戰與政治神話

黃鳳祝

向交戰方提供重型武器，發動意識形態宣傳，激化衝突各方的矛盾，尋求所謂「公正的勝利」，只會使俄烏戰爭陷入持久化的泥潭，造成更大的傷亡和破壞。全球化時代的現代戰爭，不存在公平的勝利或是制度的勝利。終結戰爭的，不是勝利，而是和平。

俄烏戰事步入第二年，歐洲政壇「熱戰」氣氛濃烈，政治討論空間逐漸收窄。在俄烏戰爭的問題上，德國政府最初堅守一條底線，即幫助交戰雙方創造和談的基礎，避免戰事升級，引發歐洲戰爭。但是

隨着戰事的蔓延，德國迫於盟友的壓力，不斷改變戰爭敘事。三月，在與美國總統拜登的會晤中，德國總理朔爾茨明確表示要擴大軍工生產，加強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。與此同時，德國國內主張停火和談的聲音，遭到政界和媒體的批評甚至妖魔化。

二〇二二年十月，德國政治學者烏爾里克·格羅（Ulrike Gierot）和哲學學者豪克·里茲（Hauke Ritz）出版新書《歐

洲的決戰》（*Endspiel Europa*），指出俄烏戰爭是美國長期準備的代理戰爭，目標在於鞏固美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。這一觀點遭到主流媒體的一致批評，格羅任教的波恩大學也公開宣布與她保持距離。

俄烏戰爭作為歐洲的內戰

格羅和里茲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西方介入俄烏戰爭的背景，批評歐盟在俄烏衝突中的立場。他們指出，歐洲的政治精英試圖捍衛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所謂的「民族國家」，而忽略了歐洲民眾的統一夢想。二戰以後，無論是阿登納的歐洲一體化，還是勃蘭特的東方政策，均強調調統

一歐洲的身份認同，主張通過經濟合作實現歐洲的永久和平。戰後歐洲的主要任務是克服民族國家，跨越地理邊界，建立一個康德主張的「歐洲共和國」。在格羅和里茲看來，歐盟只是一個依賴美國的技術官僚體，缺乏民主和精神內涵。歐盟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援助、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，違反了戰後歐洲和平解決衝突的理念。

在《新內戰》（*Der neue Bürgerkrieg*）（二〇一七）一書中，格羅提出了一個觀點：現階段歐洲的衝突主要表現為歐洲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融合的「戰爭」，這種區域內民族性的思想和利益鬥爭，超越了傳統的地緣政治，是一種新的內戰。

格羅的「新內戰」思想受到德國畫家弗蘭茨·馬爾克（Franz Marc，一八八〇—一九一六）的影響。一九一四年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，作為士兵的馬爾克撰寫了文章〈神秘的歐洲〉（*Das geheime Europa*）。他把這場戰爭視為歐洲民族的內戰，是歐洲社會新舊精神的碰撞，也是落後的民族國家精神與多民族融合精神的交鋒。馬爾克主張打破宗教信仰和地緣政治的界限，而不是通過血腥的戰爭重新定義民族國家的邊界。

與傳統戰爭不同，現代戰爭的重心不在於地理邊界的進退，而是精神價值和物質利益的爭奪。用地域版圖的擴張與得失來掩蓋實際利益的爭奪，無異於一種政治欺騙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既得利益者可以把世界戰爭的責任簡單地推卸給英國人、德國人或是俄國人。在俄烏戰爭中，媒體有關侵略者和犧牲者的主流敘事，依然是一種製造政治神話的方法。

民主與威權的政治神話

在歐洲的新內戰中，非地緣勢力借助地緣內部的矛盾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。新內戰的第一步是傳媒戰爭，通過製造政治神話，對某一制度或個人進行神化或妖魔化。政治精英通過控制媒體製造輿論，利用公關公司或租賃示威者，策劃事件或政變，發動顏色革命，推翻拒不接受利益集團支配的政府，把自己的代理人推上政治舞台，建立傀儡政府。

德國哲學家卡西爾(Ernst Cassirer, 一八七四—一九四五)的《國家的神話》(The Myth of the State) (一九四六)，是研究政治神話理論的重要著作。卡西爾對神話思想的破壞力進行了系統的分析，並提出了兩個觀點：第一，摧毀政治神話是超出哲學能力之外

的，因為神話不受理性的辯駁；第二，神話是不會消失的，只要社會環境提供充分的土壤，神話就會重新生長出來。

政治神話並不是威權國家所特有的。在《政治神話的分析與比較》(Analyse und Vergleich politischer Mythen) (二〇二〇)一書中，德國政治學者丹尼斯·魯道夫(Dennis Rudolf)指出，民主政治與威權政治都會製造政治神話，用以確定和宣傳自己統治的合法性，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差異。威權國家的政治神話，重心在於塑造國家領導人的權威性，營建韋伯式的魅力統治；民主國家的政治神話，則強調自由選舉的合法性。

魯道夫對政治神話的分析，受到德國哲學家阿多諾(Theodor Adorno, 一九〇三—一九六九)的影響。阿多諾在《啟蒙辯證法》(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) (一九四四)中指出，啟蒙運動旨在運用理性驅逐迷信和神話，但是在這一過程中，新的神話又被啟蒙思想家創造出來。

製造政治神話的目的，是為了規範眾人的理性，煽動民眾的情感，使之服從神話創造者的意識形態引導。現代政治神話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。戰後締結的《凡爾賽和約》，是一種勝利者的和約，無法解決歐洲社會內部的衝突，戰爭賠款在民

族國家引發失業通脹等一系列新的問題，加劇了歐洲社會的裂變。當理性缺失時，被煽動的情感成為政治神話生長蔓延的土壤。圍繞希特勒的「領袖神話」，最終把歐洲大陸推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。

二〇二三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，把世界描述為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。烏克蘭被塑造為反抗威權政治的主戰場，總統澤連斯基被神化為捍衛自由民主的英雄。這種政治神話的敘事，正在把歐洲大陸引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。慕安會前夕，九十三歲高齡的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發表長文，呼籲西方國家盡快促成停火談判，避免引爆更大規模的歐洲戰爭。但是，這一主張遭到西方主流媒體的批評，哈貝馬斯本人也被貶斥為「違背事實與良知」的「理性守護者」。

向交戰方提供重型武器，發動意識形態宣傳，激化衝突各方的矛盾，尋求所謂「公正的勝利」，只會使俄烏戰爭陷入持久化的泥潭，造成更大的傷亡和破壞。全球化時代的現代戰爭，不存在公平的勝利或是制度的勝利。終結戰爭的，不是勝利，而是和平。

(作者為德國慕尼黑黑大學哲學博士、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)

◎